

斩断“长蛇”的“断腰”之战

——淮海战役之攻克宿县

■吕 洋 戚苏源

1948年11月，为切断津浦铁路，分割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队，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及第9纵队一部发起对宿县（今安徽省宿州市）的进攻，全歼国民党守军1.2万余人，为后续围歼黄百韬兵团创造有利条件。

立足全局，紧盯枢纽。1948年11月6日，淮海战役发起后，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情变化，致电中央军委，提出从西、南两个方向对徐州发起攻击，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和徐州的中间地区。中央军委得知徐州刘峙集团可能实施总撤退的消息后，立刻作出就地歼灭其于徐州地区的决策，并于11月10日电示陈毅、邓小平，指出应尽快控制徐蚌段，断敌退路。此时，国民党军的部署犹如自北向南的一条蛇，“蛇头”是驻守在徐州的刘峙、杜聿明集团，“蛇身”是徐州到蚌埠之间的徐蚌铁路线，“蛇尾”是驻守在蚌埠的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。宿县北距徐州75公里，南距蚌埠90公里，是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的枢纽，也是徐州通向南京上海的门户和重要补给基地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。

选择作战目标，是改变敌我态势、转换战局的关键，必须从战略和战役全局出发进行选择，力求打敌要害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。刘伯承指出，打淮海战役，要“夹其额、揪其尾、断其腰”。攻克宿县，切断津浦路徐蚌段，对于十分依赖铁路线的国民党机械化部队而言，就是“断其腰”。攻克宿县，我军便可立于主动地位，北可牵制徐州，南可阻敌北援，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，迫敌在徐州地区与我会战，完成中央军委提出的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任务。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，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共同制订作战计划，将目标放在宿县，并决心以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和第9纵队一部于11月11日快速发起对宿县进攻。

克服困难，肃清外围。对于担任主攻的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和第9纵队，攻城面临许多困难：一是宿县城防坚固，城关筑有大量防御工事，且交通便利，城外敌人可增援，城内敌人易逃脱；二是力量不占优，国民党守军为第25军



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25团3营8连在攻城战斗中的14名勇士与兄弟部队在宿县城头合影。

148师3个团、装甲第7营及地方保安团共1.2万余人，负责攻城的我军部队仅1.3万余人，与国民党守军人数不相上下；三是装备差距大，国民党守军装备精良，囤积了大量物资装备，甚至依托城墙配备装甲车，形成环城火力支援，相比之下，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在转战大别山时扔掉重武器，之后一直未获得装备补充。此外，为确保宿县万无一失，蒋介石派津浦路司令部副司令张缙武亲自坐镇，严加防守。

面对困难，第3纵队和第9纵队一部丝毫没有退缩，在受领任务后，紧前研判宿县城防特点。为阻击可能来援之敌，力求全歼守敌于城内，部队展开具体部署，按照“肃清外围、占领四关、包围城厢、瓮中捉鳖”的战法，以第3纵队7旅负责主攻宿县东门，第3纵队9旅从西门、南门攻城，第3纵队8旅负责破坏宿县至符离集之间的铁路、桥梁，彻底扫清外围，而后从北门攻城。进攻发起后，我军与敌在宿县外围、城关展开激烈争夺战。12日，从徐州方向开来一列满载敌援军的火车，宿县城内守军派出装甲列车前来接应。第8旅23团当即立断炸毁铁路，兵分两路，迎击南北两面敌人，援敌火车被击退回符离集，第23团乘胜追

击，从东、南、西三面围攻符离集，敌仓皇溃逃。13日，第8旅22团3营向敌主要外围阵地发起进攻，战士们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，用手榴弹开路，猛打猛冲，很快就占领东关防御主要支撑点。城内敌人趁我立足未稳，连续反扑，第3营顽强抗击，牢牢守住阵地。14日，各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分别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发起猛烈攻击。15日凌晨，我军顺利扫清外围敌人，占领城关，合围主城。

合围主城，瓮中捉鳖。完成对宿县主城的包围后，第7旅和第9旅为第一梯队，分别从东门、西门突破，并在城十字路口会师。第8旅2个团、第9纵队1个团为第二梯队，在第一梯队突破城门后投入纵深战斗。宿县主城墙防依旧坚固，城墙为砖石结构，高达10余米。敌火力点分上中下3层，城墙前有地堡，城墙根有暗堡，城墙腰、顶部都有射孔，外部桥头有暗桥头堡，明暗火力相结合。守军凭借高厚城墙、宽深护城河和既设工事，负隅顽抗。

11月15日17时，我军发起总攻。由于前期作战桥梁已被守军破坏，攻城部队首先面临的难题是架桥。攻城前的炮击由于我重武器不多，只持续了半小时，并未对城墙造成太大破坏。此时进

攻命令已经下达，我军指战员置生死于度外，冒着敌密集火力架桥。在西门，第9旅25团3营7连为完成架桥任务，不怕牺牲，前赴后继，连续5次失利，终于在第6次成功架起桥梁，为突击队铺平了道路。

架桥成功后，旅工兵排连续三次在敌暗堡下投放炸药包，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，8连在爆破硝烟掩护下飞速过桥，当接近护城河桥头时，遭到敌人疯狂的火力阻挡，子弹如雨点般密集打在桥上，炮弹一个接一个在地面爆炸。8连的战士们毫不畏惧，一往无前，排长倒下了，班长带着冲，班长倒下了，战斗组长带着冲。最终，连长高玉岐带着的13名战士扑上城墙的缺口，一鼓作气登上城墙，9连也迅速跟上，协同8连击退敌反扑。攻城部队突入城内后，实施多路攻击，分割包围。经一夜激战，我军歼敌大部，并将国民党军残部压缩在城中心天主教堂。敌凭借教堂坚固工事，居高临下，墙外活动的敌装甲车封锁我前进道路。第8旅多次进攻未果，战斗陷入僵持状态。为打开局面，爆破组在机枪掩护下，巧妙利用装甲车射击死角，携带炸药隐蔽在马路一侧排水沟，当装甲车接近时迅速把炸药包扔到装甲车上。但装甲车前盖形如鱼背，车又在运动中，圆形炸药包还没爆炸就滚下车。为快速解决战斗，爆破组建建福冲到装甲车前，迅速将炸药包硬塞到装甲车履带前后轮中间，将装甲车炸瘫，从而顺利攻占敌最后据点。张缙武见大势已去，仓皇出逃，后被我军俘虏。至此，宿县宣告解放，国民党宣称“固若金汤”的宿县，最终被我军攻克。

攻占宿县，我军控制了徐州到蚌埠间100余公里铁路，切断了津浦线，将徐州和蚌埠地区国民党军割裂成南北两块，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，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，为淮海战役决胜利赢取关键一仗。



史说新语



延安电影团成员们在清凉山的岩石上拍摄素材。

延安电影团——

用镜头记录抗战故事

■顾致远 黄子石 杨润鑫



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《南泥湾》画面。

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，国民党当局借助在宣传媒介的垄断优势，抹黑丑化我党形象，阻挠国内外记者探访根据地，对陕甘宁边区的真实信息实施全面封锁。在这种严酷的舆论环境下，党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，通过电影这种影响较大的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，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，更真实有力地宣传抗日。

1938年秋，随着电影人袁牧之与吴印咸等人携带着电影器材抵达延安，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——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（又称延安电影团）正式成立，从此开启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红色历史的影像记录。

在创办之初，延安电影团面临极其艰苦的创作环境：全团仅有袁牧之、吴印咸、徐肖冰、李肃等6名核心成员，办公地点是延安北门外凤凰山北头的几孔土窑洞，设备仅有“两动三呆”（两台摄影机、三台照相机）。这丝毫没有影响电影团成员们的创作热情。在党中央“用影像记录真实中国”的指示下，电影团迈出党的电影事业第一步，开始积极筹划拍摄首部纪录片《延安与八路军》。

为获取真实素材，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大量镜头后，冒着危险穿越敌军封锁，进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实地拍摄。此外，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，电影团还记录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工作的情景；陕甘宁边区军民战斗、生产、生活的场景；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

及延安的自然风貌；晋东南、晋西北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、民兵和儿童团的斗争；白求恩在战地医院救死扶伤的工作场景……

历时1年多，电影团终于完成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前期拍摄。当时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，中央决定派袁牧之与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，完成《延安与八路军》的后期制作。当底片全部洗出准备进行剪辑和配音时，苏德战争爆发。撤退过程中，《延安与八路军》底片不幸遗失。所幸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，在后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被修复洗印，得以与世人见面。

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敌军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上，电影团也面临更严峻的考验。电影团成员们主动响应“精兵简政”号召，开垦荒地种植小米土豆，开办照相馆为军民服务，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。面对胶片告罄，后期制作条件差的艰难局面，电影团充分发挥团队智慧，成功完成多项拍摄和放映任务。没有洗印设备，他们使用延河水进行冲洗，自己搭建起洗印胶片的暗室；没

有录音条件，他们就借用手摇马达、留声机和扩音器在银幕后面配乐解说；拍摄胶片短缺，他们大胆创新，将过期的正片作为底片使用，反复试验、调整曝光，让原本无用的过期胶片发挥出作用……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创新能力，他们独立完成第一部完整纪录片《南泥湾》。这部影片不仅记录了八路军第359旅挖窑洞、开荒地、修路筑桥、烧炭造纸，将“烂泥湾”变为“陕北好江南”的壮举，还记录了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场景，成为激励几代人的经典画面。

电影团在拍摄记录革命历史的同时，也重视青年力量的培养。面对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，电影团成员们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摄影实践技术编写了教材，还开设了摄影课程。1942年起，电影团先后开办多期摄影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支五十多人的摄影队伍。这些在培训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，前赴后继奔向战场前线，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核心人才。

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，电影团成员们将摄影器材当作战斗武器，用镜头定格下

无数震撼人心的瞬间。他们摄制出《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》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》等纪录片，留存了《白求恩大夫》《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》等影像资料，记录了根据地军民生产自救、民主选举、军事训练等历史场景，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等真实活动的照片。这些影像作品，从黄土高原的窑洞出发，跨越重重封锁，到达国统区、沦陷区乃至海外进行放映，打破了外界对边区的信息隔绝，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，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，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支撑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电影团的主要成员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，电影团也随之解散。80余年过去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仍沿用“工农兵”标识，延安电影团的基因仍在延续。实践证明，艺术不仅是时代的镜像，更是革命的独特力量。



链接历史

“九曲黄河十八弯，千年筏子百年桥。”古称“革船”的羊皮筏子，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是黄河两岸人民运输人员、物资的重要工具。革命战争年代，羊皮筏子作为渡河工具，立下了“不朽功勋”。70余年前，我军在临夏各族群众协助下，用羊皮筏子抢渡黄河天堑，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、民族团结的战斗壮歌。

1949年8月4日，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向各兵团下达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，并作出具体部署。其中，第1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领第1军、第2军和第62军，发起兰州战役的左翼攻势，取武山、陇西、渭源，得手后经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，断青马退路。

8月22日至23日，王震率军连续攻占康乐、宁定、和政、临夏、永靖5城。26日兰州解放后，部队根据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命令，准备渡过黄河，直插西宁，解放青海。随后，部队分别进至莲花、循化和大河家渡口，着手抢渡黄河的各项准备。

当时正值雨季，黄河暴涨，水流湍急，原有渡口被守敌在逃跑时破坏。能否成功抢渡黄河，事关西北解放大局成败。部队首长亲临河岸，察看地形，研究对策。面对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实际，部队首长最终放弃架设浮桥的计划，决定依靠当地各族群众，用羊皮筏子和木船抢渡黄河。

解放后的临夏各族群众，以空前高涨的热情，倾力支援解放军渡河。大家有船出船、有人出人，两三日的工夫就组织水手500余人，筹集羊皮筏150余只、木船2条，为大军渡河创造了便利条件。

8月28日，抢渡黄河的战斗打响。水手们紧握桨板，驾驭着满载战士的羊皮筏子，以娴熟的技术划向对岸。渡河期间，当地群众不顾安危，纷纷跳进黄河，推船拉纤，牵马抬炮，抢救落水战士……为加快渡河速度，军民不断改进渡河方式，羊皮筏子从每次乘坐5人增加到7至8人，渡河次数也从1天5次提高到10次左右。由于木船数量少且战马又不能用皮筏摆渡，直接影响了进军速度。为解决这一难题，当地群众想出一个办法：将战马分成若干群，挑选强壮的战马在前面引渡，其余的战马在后跟随，同时让两名水手溺水尾随，驱赶战马渡河。这一方法不仅提高了渡河效率，还减少了战

马的伤亡。

9月4日，经过几昼夜连续奋战，10万大军和2000余匹战马及大量军用物资顺利渡过黄河，打开了解放青海的锁钥，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又一奇迹。

至今当地仍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：“羊皮筏子当军舰，渡过大军十多万，筏子客们真英勇，支援前线扬美名。”这段历史虽已过去70余年，昔日军民齐心、夜以继日抢运大军渡黄河的紧张场景也已化为一派宁静，但革命先辈不惧艰难、奋勇直前的精神永存临夏人民心中。



鹰喙衔霜碎暮烟

——中国古代兵器之钩

■曹 波 留纪可

钩原本指首部弯曲、可用于脱、拉、勾、拽、割的器具，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期的吴国。《吴越春秋》记有“阖闾既宝莫邪，复命于国中作金钩”。

伴随着古代人类征伐、战争频发，钩逐渐被运用于军事领域，兵器钩出现。战国时期，城防战时已大量使用钩，用以钩取攀城和地道进犯之敌。钩是一种刃部弯曲、以钩、锁、割、挑、刺为核心的格斗兵器，一般由钩首、钩身和钩把构成。由于钩单独使用时战斗力较小，在战场上一般作为辅助性兵器，与戈、戟、矛等主战兵器配合使用。《墨子·鲁问》中提到：“公输若鲁南游楚，焉始为舟战之器，作为钩强之备，退者钩之，进者强之。量其钩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……”这里的“钩强”就是兵器“钩”和“拒”，是鲁班为楚国制造的水战武器，能在敌船后退时用钩拉住，前进时用拒推开，水军通过控制敌方船只距离，进而配合其他兵器杀伤敌军。

钩除单独作为兵器外，古人还将钩与其他兵器融合成复合型兵器。汉朝出现了一种钩、盾复合的防御性兵器，称为钩锁。该兵器以小型铁盾为核心用以推挡，盾前有一短刺用于刺击，盾的上下有细长的钩

用以钩束敌兵。士兵在战斗时，常以钩锁与环首刀配合使用而攻防兼备。唐朝以后，此类带钩的复合型兵器更多。比如，宋朝军队常使用钩与枪合一的兵器，如单钩枪、双钩枪、拐枪、钩镰枪等。明朝士兵常用的长兵器有铁钩枪、钩镰刀，还有由铁索、绳索与钩构成的软兵器飞钩，用以钩取敌军。清朝绿营兵还使用过三须钩、铁挑、月牙钩戟、铁钩等多种钩形兵器。

此外，钩也被民间视为武术器械。比如，钩尖如扁担头的鹰嘴钩，钩身有叉的鹿角钩，还有带月牙状护手的护手钩。护手钩因常出现于武术表演中、双持短钩造型威猛而被人熟知。护手钩一般认为发于明朝而成于清朝。清朝武术典籍《手臂录》中记有“双钩之制，似戟而曲，能锁他兵……钩身带刃，可格可割。”该兵器的钩首无尖而成钩形，作战中可用来钩拽、拉扯敌人、敌兵器；钩身如剑，有的还两侧开刃；钩把后端有尖，呈锥形，可用于刺击；护手为月牙形铁刃，位于钩身和钩尖之间手持区位附近，用于格斗时保护使用者的手部。护手钩在演练时需配合灵活步法以避免自伤，因而比较难练。

上图：汉朝时期的铁钩锁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